

城市等级视角下经济转型 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差异

钟 韵 邹云龙

摘要 处在转型升级时期的产业发展势必受到经济转型的影响,影响因在不同等级城市而不同。构建经济转型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分析框架,将反映经济转型的全球化、市场化和去中心化作为影响产业发展的三大主要解释变量,探讨经济转型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进一步细化研究,运用城市等级理论对全国 286 个地级市进行等级划分,以对比经济转型在不同等级城市中对生产性服务业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1) 经济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并未完全体现出来;(2) 全球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不论在全国还是各等级城市都是最大的;(3) 市场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积极作用在全国层面并未表现出来,但对高等级城市是显著的;(4) 去中心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在全国层面和在高等级城市都是显著的,但在低等级城市中未体现。

关键词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经济转型;城市等级;交互项

中图分类号 F7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298(2016)04-0079-11

一 引 言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快速转型期,在转变发展方式与调整产业结构的要求下,服务业发展势头迅猛。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城市经济增长新动力的作用日益明显,国内各级城市均将其作为重点领域和内容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表明,市场化、全球化、去中心化等经济转型现象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我国 31 个省市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高的地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越明显,产业的发展水平也较高(熊凌云等,2015)^[1]。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生产性服务业 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都具有促进作用(何青松等,2012)^[2]。对法国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表明,防止产业发展的空间极化,发挥不同等级城市的特长,有助于提升国家整体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创新水平(Moulaert 和 Gal-louj,1995)^[3]。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经验还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呈非均衡发展,城市等级不同,该产业的结构和层次也不相同。企业总部、金融中心主要集中在全球性城市(Sassen,

收稿日期 2016-02-2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全球化:过程、格局、动力与空间”(项目编号:41130747,项目主持人:薛德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城市等级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41371174,项目主持人:钟韵);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基于服务业增长收敛性的区域服务业空间关联机制与优化政策研究——以大珠三角地区为例”(项目编号:13YJC790222,项目主持人:钟韵);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市等级提升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影响——以广州为例”(项目编号:S2013010012369,项目主持人:钟韵);广东产业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合作研究中心、暨南大学经纬粤港澳经济研究中心资助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钟韵,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务业与区域发展;邹云龙,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城市发展。

2001)^[8]，高级专业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如会计、保险、法律、管理咨询和金融服务）集聚在少数的高等级城市，而非大都市区或者人口规模较小的都市，在吸引生产性服务业布局方面则处于相对的劣势（Coffey，1990）^[9]。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速度都与城市等级存在正向相关性（钟韵等，2010^[10]；魏守华等，2010^[11]）。综上所述，经济转型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城市等级规模不同，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亦存在差异。城市的市场化程度、国际化水平，乃至地方经济发展的自主性等要素对不同等级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构成影响，那么，这些影响是否存在差异？造成不同等级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科学评估经济转型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影响，需要将经济转型具体化，进而使其量化。基于已有研究，本文构建经济转型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分析框架，运用我国 286 个地级市的生产性服务业数据，探讨经济转型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考虑到我国地级市数量较多，不同规模地级市受经济转型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根据城市的人口规模将城市进行规模等级划分。通过引入交互项变量构建面板分析模型，运用 2002—2012 年的数据，探讨经济转型在我国不同等级城市中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并对影响的差异进行比较。将经济转型的产业影响细化至不同规模的城市，有利于各级城市因应经济转型的趋势，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二 理论基础与分析思路

我国正处于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从低技术粗放式经济向高技术集约式经济过渡的阶段，经济转型研究对减少资源错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具有重要影响（曹玉书等，2012）^[12]。为使研究更为细化，本文在城市等级理论框架下分析经济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一）来自经济转型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术界对经济转型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3）^[13]认为，转型体现在法制建设、市场改革、对外开放、文化教育等方面。也有学者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转型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相比俄罗斯，为企业提供了更稳定和支持性的制度环境（Hitt et al.，2004）^[14]。有研究从转型的成本出发，认为我国在 2007 年之后发展方式转换和全球化成本增加，通过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风险在增大（陈丹丹，2010）^[15]。也有从企业角度的研究认为，人力资本的增强、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企业家的变革能力是企业成功转型的关键（彭泗清等，2013）^[16]。关于转型的推动力，有研究从经济体制的角度出发，认为市场化改革促进了转型期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康继军等，2007）^[17]。

在对宏观经济的转型分析中，Wei（2001）^[18]提出从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市场化（Market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三化过程”分析框架（Triple Processes Framework），较为全面地概括了经济转型的动因。在其“三化过程”的分析框架中，去中心化是指我国从改革开放以后，地方政府发展的自主性在逐渐加强，主要体现在各地区财政收入的留存比稳步上升；全球化是指我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之后与国际市场的融合愈加密切，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并从中受益；市场化是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逐渐减少，市场引导逐渐替代了政府“有形的手”，成为经济发展的方向标。此分析框架在地区非均衡、产业集聚和土地利用等研究中被广泛运用，并被认为是可以较全面地分析中国经济转型问题（Li et al.，2015^[19]；He et al.，2008^[20]；Liao et al.，2012^[21]）。

处在转型升级时期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受经济转型影响，因此，本文首先构建经济转型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分析框架，然后以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化过程”作为切入点，将“经济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具体化为“去中心化、国际化和市场化等三项指标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的影响”。

（二）城市等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国际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在布局时，会明显受到城市等级的影响，相关行业会从区域高等级城市向低等级城市逐步延伸（路旭等，2012）^[13]。城市等级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以下影响：第一，区域中心城市有更大的市场和资源，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第二，区域内，生产性服务业会从高等级城市向低等级城市扩散；第三，生产性服务在高等级城市之间也有着明显的流动（钟韵等，2010）^[14]。

城市等级理论指出，城市体系内不同等级的城市，其职能与产业发展路径均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心地理论指出，城市体系内的高等级城市是区域的服务中心，为区域内低等级城市提供各类高质的服务。实证研究也发现，不同等级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较大差异。例如，对美国 1958 - 1977 年商务服务业空间分布结构变化的研究表明，商务服务业呈现由大城市向小城市“下渗”的态势（Kirn，1987）^[15]，虽然中心县的商业和专业服务集聚程度高于非中心县，但非中心县的增长速度更快，这说明了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中小城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将更迅速（hUallacháin 和 Reid，1991）^[16]；Beyers，1993）^[17]。

关于城市等级的划分标准，早在上世纪中叶，城市地理学家 Zipf（1949）^[18] 在其《人类行为和费力的最小原则》中就构建了基于人口规模的城市等级理论模型。针对我国的国情，常见的城市等级划分标准还有，运用 GDP 规模、城市建成区面积，乃至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将多个与城市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指标聚类为一个综合指数，进行城市等级划分（李震等，2010）^[19]；钟业喜等，2011）^[20]；钟韵等，2013）^[21]。本文借鉴 Zipf 的做法，使用城市常住人口数进行城市等级划分。

（三）分析思路

在经济转型和城市等级理论共同构建的分析框架下，将经济转型细化为全球化、市场化和去中心化三项内容，并以此三项内容作为解释变量；将反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三项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再将城市划分成三个等级，为实现比较不同等级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受经济转型影响的差异，在面板数据模型中运用了虚拟变量（Dummy）区分高等级城市和低等级城市，以期通过交互项变量对比经济转型三项内容在不同等级城市中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的差异。

在虚拟变量的设定中，作两次划分：首先将城市等级最高的特大型城市单独分出来，研究经济转型对特大型城市与非特大型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影响的差异；然后将特大型城市 and 大型城市划为一类（称为大型以上城市），研究经济转型对大型以上城市与中小型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影响的差异。

三 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城市等级划分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于 2003 - 2013 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少数缺失数据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中补充。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位于市区，指标主要为市辖区口径的数据。为使计算单位统一，本文将所有以外币计算的指标均用当年的人民币平均汇率换算成本币，所有以比重表示的指标统一为百分比指标。

本文参考 2014 年 11 月 20 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使用城区常住人口数来划分城市规模。从数据的权威性和可获得性出发，根据 2010 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获得的各地级市城区常住人口数据，将我国 28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①划分成三个等级：城区常住人口大于

① 本文选取的样本是地级市和直辖市，其中地级市去掉了严重缺少数据的拉萨和 2011 年以后新设立的所有地级市，同时保留了 2011 年才降级的地级市巢湖。

500 万为特大型城市、100 – 500 万为大型城市、100 万以下为中小型城市。

表 1 2010 年我国按人口规模划分各等级城市情况

城市等级	城区人口规模	城市数量	典型城市
特大型城市	500 万以上	17	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重庆、武汉、东莞、成都、佛山、沈阳、南京、苏州、青岛、石家庄、哈尔滨、杭州
大型城市	100 万 ~ 500 万	96	西安、郑州、长春、兰州、长沙、福州等
中小型城市	100 万以下	173	克拉玛依、铁岭、通辽、东营、延安、许昌、昭通等

数据来源：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

(二) 变量设计

本文的变量分为因变量、自变量、虚拟变量 (*Dummy*) 和控制变量, 在计量分析过程中还生成了交互项 (*Interaction*) 。具体变量设计如下 (表 2) :

1. 因变量。由于中国地级市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数据非常缺乏, 仅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有该产业细分行业的全市和市辖区口径的就业数据。鉴于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分布在城市市辖区, 因此, 本文以市辖区就业人数 (*PSE*) 来反映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

2. 自变量。

(1) 全球化。FDI 和外贸进出口总额被普遍认为是能较好反映当地产业全球化程度的指标 (杨仁发等, 2012)^[24]。由于地级市层面的统计中, FDI 的数据缺失较为严重, 因此本文使用数据统计较为完整的城市外贸进出口总额 (*Tra*) 反映一个城市的全球化程度。进出口总额越大, 说明城市与国际市场关系越紧密, 越容易受到市场需求和先进技术的影响。

(2) 市场化。一般认为, 市场化发展比较成熟的经济体中非公有制经济往往比较发达, 所以非公有制企业增加值 (张杰等, 2011)^[27] 等常被学者用于表示市场化水平。本文以非公有制企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 (*Mar*) 作为衡量市场化的指标。就业人员中非公有制比重越高, 说明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大, 市场化程度越高。

(3) 去中心化。在经济发展领域, 去中心化一般是指经济体独立自主决定发展政策的程度。地方政府拥有多大的财政自由往往决定了其独立自主发展的水平。地方与中央的税收分配比例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地方的财政自主水平 (Wei, 2001)^[14]。本文用地方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 (*Dec*) 代表城市的去中心化水平, 比重越高, 反映地方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受中央的束缚越少。

本文设定三个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 以期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定, 避免因缺少重要变量而导致误判。三个控制变量分别为: (1) 经济发展水平, 它决定了当地生产性服务业的类型和层次, 本文用人均生产总值表示; (2) 人才储备, 它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必要保障, 本文使用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①表示; (3) 工业发展水平, 工业的发展会直接增加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本文选取第二产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作为对应的指标。

根据城市等级的划分结果, 为了更好地反映与比较高、低等级城市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影响因素的差异, 本文使用两个二分类虚拟变量 *C1* 和 *L1*, 并做了如下两种设定: 第一种设定区分特大型城市与非特大型城市, *C1* 对特大型城市取 1, 对非特大型城市取 0; 第二种设定区分大型及以上城市与中小型城市, *L1* 对大型及以上城市 (包括特大型城市和大型城市) 取 1, 对中小型城市取 0。

① 沈坤荣和耿强 (2001)^[28] 曾使用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来表示人才素质。

表2 变量选取及表示

变量类型	名称	具体指标	单位	变量表示
因变量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	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	万人	PSE
自变量	经济 转型 变量	全球化	外贸进出口总额	万元
		市场化	非公有制单位就业比重	%
		去中心化	地方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	%
	控制 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生产总值	万元
		人才储备	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	万人
		工业发展水平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
	虚拟 变量	第一类城市 (分类法一)	特大型城市	无
		第一类城市 (分类法二)	大型及以上城市	无

本文用城市人口规模划分出三个城市等级,用虚拟变量对三个城市等级进行了高低等级的分类,最后用虚拟变量分别与全球化、市场化和去中心化组成交互项,其目的在于:通过回归结果中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来比较三大解释变量在高、低等级城市中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若仅将城市等级作为控制变量,则无法具体比较经济转型在不同等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所产生影响的差异。

(三) 模型设定及方法

根据本文的思路框架和指标选择,构建全对数的面板数据模型。

首先,为研究经济转型的全球化、市场化和去中心化对全国层面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本文构建混合回归方程(1)。然后在方程中引入虚拟变量 $C1$,通过 $C1$ 的估计系数是否显著,可以检验本文进行的城市分类是否正确。

$$\ln PSE = \alpha_1 \ln Tra + \alpha_2 Mar + \alpha_3 Dec + \alpha_4 \ln Hum + \alpha_5 MGD + \alpha_6 \ln PGDP + \alpha_7 C1 + \varepsilon_1 \quad (1)$$

其次,引入虚拟变量与全球化、市场化和去中心化组成的交互项,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方程组(2)、(3)、(4)。交互项能够将上述“三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细化到不同等级城市,从而方便我们比较生产性服务业在不同等级城市中所受影响的差异。以方程(2)为例,特大型城市和非特大型城市全球化指标 Tra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beta_1 + \beta_2$ 和 β_1 。

$$\ln PSE = \beta_1 \ln Tra + \beta_2 \ln Tra * C1 + \beta_3 Mar + \beta_4 Dec + \beta_5 \ln Hum + \beta_6 MGD + \beta_7 \ln PGDP + \beta_8 C1 + \varepsilon_2 \quad (2)$$

$$\ln PSE = \beta_1 \ln Tra + \beta_2 Mar + \beta_3 Mar * C1 + \beta_4 Dec + \beta_5 \ln Hum + \beta_6 MGD + \beta_7 \ln PGDP + \beta_8 C1 + \varepsilon_3 \quad (3)$$

$$\ln PSE = \beta_1 \ln Tra + \beta_2 Mar + \beta_3 Dec + \beta_4 Dec * C1 + \beta_5 \ln Hum + \beta_6 MGD + \beta_7 \ln PGDP + \beta_8 C1 + \varepsilon_4 \quad (4)$$

最后,对应第二种城市分类思路,将方程(1) – 方程(4)中的虚拟变量 $C1$ 替换成 $L1$,得到方程(5) – 方程(8)。通过两组方程回归结果的对比,可以得出全球化、市场化和去中心化对高低等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的差异。考虑到文章篇幅,在此方程(5) – 方程(8)不一一列出。

四 经济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为了解经济转型对我国所有地级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将经济转型量化为全球化、市场化和去中心化,并将其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加入模型。

对方程(1)和方程(5)进行混合 OLS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虚拟变量 $C1$ 和 $L1$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不同等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规模之间存在不容忽视的差距,对城市进行分级研究,能提高研究的精度。

表3 方程 (1) 和方程 (5) 的混合回归结果

变量	方程 (1)	方程 (5)
<i>Constant</i>	0.267 [*] (0.1490)	0.382 ^{**} (0.1550)
<i>Tra</i>	0.0750 ^{***} (0.0074)	0.0848 ^{***} (0.0078)
<i>Mar</i>	-0.0184 ^{***} (0.0013)	-0.0203 ^{***} (0.0013)
<i>Dec</i>	0.0146 ^{***} (0.0033)	0.0165 ^{***} (0.0035)
<i>Hum</i>	0.408 ^{***} (0.0098)	0.385 ^{***} (0.0111)
<i>MGDP</i>	0.0000 (0.0010)	-0.0034 ^{***} (0.0010)
<i>PGDP</i>	0.202 ^{***} (0.0214)	0.216 ^{***} (0.0223)
城市等级效应		
<i>C1</i>	0.945 ^{***} (0.0495)	
<i>L1</i>		0.356 ^{***} (0.0296)
样本量	2933	2933
R²	0.743	0.72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为了将研究经济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细化到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本文将城市等级虚拟变量分别与全球化、市场化和去中心化组成交互项。方程 (2) – 方程 (4) 将城市分为特大型城市和非特大型城市，方程 (6) – 方程 (8) 将城市分为大型及以上城市和中小型企业城市，通过豪斯曼检验确定使用随机效应模型 (RE)，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为了便于比较，本文适当调整方程的排列顺序。

表4 方程(2) - (4)与方程(6) - (8)的RE回归结果

变量	方程(2)	方程(6)	方程(3)	方程(7)	方程(4)	方程(8)
<i>Constant</i>	-0.7030*** (-4.66)	-0.5412*** (-3.44)	-0.7335*** (-4.85)	-0.8117*** (-5.20)	-0.7685*** (-5.10)	-0.8527*** (-5.67)
<i>C_i</i>	-1.0582* (-1.79)	-0.4442** (-2.28)	0.6195 (1.42)	0.4469** (2.17)	1.3207*** (7.63)	0.7222*** (9.58)
经济转型效应						
<i>Tra</i>	0.0532*** (5.54)	0.0181* (1.71)	0.0566*** (5.90)	0.0499*** (5.17)	0.0576*** (6.02)	0.0482*** (5.00)
<i>Mar</i>	-0.0002 (-0.23)	0.0000 (0.02)	-0.0002 (-0.24)	-0.0007 (-0.67)	0.0000 (0.03)	0.0003 (0.26)
<i>Dec</i>	0.0067*** (2.76)	0.0060** (2.50)	0.0067*** (2.76)	0.0070*** (2.87)	0.0056** (2.25)	-0.0001 (-0.04)
交互项效应						
<i>Tra* C_i</i>	0.1591*** (4.66)	0.0959*** (7.17)				
<i>Mar* C_i</i>			0.0118** (2.42)	0.0049** (2.19)		
<i>Dec* C_i</i>					0.0322*** (2.67)	0.0216*** (4.69)
控制变量的影响						
<i>Hum</i>	0.1846*** (14.03)	0.1627*** (12.21)	0.1827*** (13.84)	0.1613*** (11.99)	0.1860*** (14.11)	0.1610*** (12.01)
<i>MGDP</i>	-0.0036*** (-3.50)	-0.0036*** (-3.52)	-0.0039*** (-3.76)	-0.0047*** (-4.62)	-0.0038*** (-3.64)	-0.0043*** (-4.22)
<i>PGDP</i>	0.2299*** (13.36)	0.2476*** (14.33)	0.2327*** (13.48)	0.2510*** (14.36)	0.2320*** (13.46)	0.2514*** (14.49)
R ²	0.6667	0.6748	0.6613	0.6431	0.6729	0.6566
样本量	2933					

注: ***, **, *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在方程(2)、(3)、(4)中 $C_i = C1$, 在方程(6)、(7)、(8)中 $C_i = L1$; 括号里是Z统计量。

(一) 经济转型对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尚未充分体现

由表3可知,不论方程(1)还是方程(5),经济转型的全球化指标 *Tra* 和去中心化指标 *Dec* 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说明全球化和去中心化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市场化指标 *Mar*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市场化并未表现出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与预期效果相反。

对外开放无疑是过去 30 多年来我国产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对外开放推进下的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外资企业管理模式的引进、海外市场的扩大等因素促使我国全球化程度不断提升，为生产性服务业的良性发展营造了环境。去中心化表现为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激励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通过多次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留存更多的发展资源，提升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能力（Wei，2001）^[4]，进而提升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自主能力，加强了地方政府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显示出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推进市场化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工作，对产业发展的意义与扩大开放可谓不相伯仲。但市场化目前从总体上看，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尚未体现出积极作用，这可能与我国目前的市场化发展程度有关。

（二）全球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最大

表 3 中，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化指标 Tra 的估计系数在方程（1）和方程（5）中分别为 0.075 和 0.0848，市场化指标 Mar 的估计系数为 -0.0184 和 -0.0203，去中心化指标 Dec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0146 和 0.0165， Tra 的估计系数远大于 Mar 和 Dec 的估计系数，表 4 中各方程的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这说明，相比于经济转型中的市场化和去中心化，全球化不仅在总体上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是最大的，而且在各个城市等级中，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也是最大的。

我国较早开始实行外向型经济战略，对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一方面，开拓国际市场有效挖掘了更多的市场需求，促进了产业发展。商务部部长高虎城（2015）曾指出，中国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表明，对外贸易是我国稳增长、保就业的重要支撑，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外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 18% 左右，带动就业 1.8 亿人次。“十二五”期间（2011-2015），服务贸易增速远超货物贸易，其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稳步上升，2015 年在我国对外贸易减少的情况下，服务贸易实现了 14.6% 的增长，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达到 15.4%。另一方面，通过引进外资企业，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溢出效应，对内资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去中心化通过增加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改善了产业的发展环境，而全球化则不仅营造了市场环境还为产业提供了发展机会，因此，相比之下全球化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作用大于去中心化的作用。

（三）市场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取决于当地的市场化发育水平

表 3 中，方程（1）和方程（5）市场化指标 Mar 的估计系数都为负且趋于 0，说明市场化对全国层面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尚未发挥。从表 4 方程（3）和方程（7）的回归结果中发现， Mar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0002 和 -0.0007，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市场化与城市等级组成的交互项 $Mar * C1$ 和 $Mar * L1$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0118 和 0.0049，且都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虽然市场化对我国低等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不显著，但对高等级城市却是显著的。本文样本中 286 个地级市里面中小型企业占比达 60.5%，特大型企业占比仅为 5.9%，因此，尽管市场化对高等级城市的产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数量较少，最终导致从全国总体层面来看，市场化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并未显现。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市场化的运作需要制度的保障，市场化的发展水平与地方的制度环境建设水平密切相关，而总体而言，我国目前高等级城市的制度建设要较中小城市更为完善，地方保护主义、人情关系网络在中小型企业仍或多或少地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由于制度建设水平存在差异，市场化的成效在不同等级城市有所区别，从而导致其对当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作用也存在差异。市场化目前主要对高等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表现出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对中小型企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影响则并不显著。

（四）去中心化对全国和大型以上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促进作用

在表 3 混合回归结果中，去中心化指标 Dec 的估计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从全国整体上看去中心化对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表 4 分城市等级回归结果中，方程（4）和方程（8）中

去中心化指标 Dec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0056 和 -0.0001, 前者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 后者却并不显著。这说明, 去中心化对大型加中小型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但对中小型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而交互项 $Dec^* C1$ 和 $Dec^* L1$ 的估计系数为 0.0322 和 0.0216, 并且都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去中心化对特大型城市、以及特大型加大型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综上可知, 经济转型中的去中心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积极作用在全国层面是显著的, 从城市等级看, 对特大型城市和大型城市显著, 对中小型城市则并未体现。

究其原因, 本文认为,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断简政放权, 调动地方积极性, 推进税务体制改革, 逐步加大了地方政府税收留存比, 给予更大的财权, 增强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另外, 我国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其行政级别及地区影响力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特大型城市或大型城市, 多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或区域的次中心城市, 由于行政级别的作用, 其地方发展自主权相对较大, 对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优势亦由此得以体现。

五 结论与启示

将我国 286 个地级市按城市人口规模分为特大型城市、大型城市和中小型城市三类, 比较其生产性服务业就业规模排名与城市人口规模排名发现: 特大型城市中 73.3% 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规模排名优于本地按城市人口规模的排名, 大型城市中这一比例为 53.2%, 中小型城市这一比例则为 34.5%。换言之, 我国不同等级的城市, 其生产性服务业与城市人口规模发展速度并不完全匹配, 特大型城市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最快的城市类型。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经济转型要素在不同等级城市中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存在何种差异。

为探析经济转型对我国不同等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构建经济转型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分析框架, 同时将经济转型细化为全球化、去中心化和市场化等三个过程, 通过虚拟变量和交互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 (1) 从全国层面来看, 经济转型的全球化 and 去中心化过程对生产性服务业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只有市场化的影响为负。(2) 全球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是经济转型中最强的, 其积极作用在各等级城市中均有体现。(3) 由于国内不同等级城市的市场化水平存在差异, 高等级城市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 因此市场化只对高等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体现出积极的推进作用。(4) 去中心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积极影响在范围和力度上位于全球化和市场化之间, 其对中小型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尚未体现。

综上, 本文认为应该尊重并遵循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规律, 不同等级的城市应该采取差异化的产业发展措施。特大型城市具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最佳条件, 应该积极引进海外先进技术并利用广阔的国际市场, 打造资本、知识、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 (胡艳和朱文霞, 2015)^[9], 积极培育发展为我国服务业领域的桥头堡。大型城市可依托自身区域中心城市地位, 根据自身产业发展状况及区域内产业发展的需求, 有针对性地发展与制造业关联性较强的生产性服务业, 利用产业空间互动策略提升城市的运行效率和产业结构 (金晓雨, 2015)^[10]。中小型城市则建议主要从自身的特色产业出发, 发展专业性的生产性服务行业。最后, 区域内不同等级城市在进行产业布局时应该注重协调分工, 以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熊凌云, 杨李娟, 彭涛. 集聚效应、生产性服务业与市场化进程——来自全国 3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经验 [J]. 中国物价, 2015, (2): 76-78.
- [2] 何青松, 张培英, 苑圣波. 生产性服务业 FDI 技术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J]. 经济问题, 2012, (1): 83-86.

- [6] Moulaert, F., Gallouj, C..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French Space Economy: Decentralisation at the Highest Level [J]. *Progress in Planning*, 1995, 43(2): 139-154.
- [7]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M]. Updated 2nd ed.,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8] Coffey, W. J., McRae, J. J.. *Services Industri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M]. Montre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 1990.
- [9] 钟韵, 闫小培, 林彰平. 高等级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输出空间特征——基于广州商务服务企业行为的探讨 [J]. *地理研究*, 2010, (12): 2166-2178.
- [10] 魏守华, 韩晨霞. 城市等级与服务业发展——基于份额偏离分析法 [J]. *产业经济研究*, 2010, (4): 32-39.
- [11] 曹玉书, 楼东玮. 资源错配、结构变迁与中国经济转型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 (10): 5-18.
- [12]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张平, 刘霞辉, 袁富华. 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风险与效率提升路径 [J]. *经济研究*, 2013, (10): 4-17, 28.
- [13] Hitt, M. A., Ahlstrom, D., Dacin, M. T., et al.. The Institutional Effects on Strategic Alliance Partner Selec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China vs. Russia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4, 15(2): 173-185.
- [14] 陈丹丹. 中国经济转型成本的测度: 1978~2007年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0, (2): 40-53, 77.
- [15] 彭泗清, 李兰, 潘建成等. 经济转型与创新: 认识、问题与对策——2013·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 [J]. *管理世界*, 2013, (9): 9-20.
- [16] 康继军, 张宗益, 傅蕴英. 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 [J]. *管理世界*, 2007, (1): 7-17, 171.
- [17] Wei, Y. D.. Decentralization, Mar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Triple Processes Underly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J]. *Asian Geographer*, 2001, 20(1-2): 7-23.
- [18] Li, H., Wei, Y. H. D., Liao, F. H. F., et al..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and Urban Land Expans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J]. *Applied Geography*, 2015, 56: 177-186.
- [19] He, C., Wei, Y. H. D., Xie, X. Z..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in China [J]. *Regional Studies*, 2008, 42(7): 923-945.
- [20] Liao, F. H. F., Wei, Y. H. D.. Dynamics, Space,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Provinc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Guangdong Province [J]. *Applied Geography*, 2012, 32(1-2): 71-83.
- [21] 路旭, 马学广, 李贵才. 基于国际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布局的珠三角城市网络空间格局研究 [J]. *经济地理*, 2012, (4): 50-54.
- [22] Kim, T. J.. Growth and Change in the Service Sector of the U. S.: A Spatial Perspective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7, 77(3): 23-55.
- [23] hUallacháin, B. Ó., Reid, N.. The Location and Growth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American Metropolitan Areas, 1976-1986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1, 81(2): 254-270.
- [24] Beyers, W. B.. Producer Services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3, 17(2): 221-231.
- [25] Zipf, G. K.. *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M]. MA: Addison Wesley, 1949.
- [26] 李震, 杨永春. 基于GDP规模分布的中国城市等级变化研究——等级结构扁平化抑或是等级性加强 [J]. *城市规划*, 2010, (4): 27-31.
- [27] 钟业喜, 陆玉麒. 基于铁路网络的中国城市等级体系与分布格局 [J]. *地理研究*, 2011, (5): 785-794.
- [28] 钟韵, 黄民勃. 城市等级差异下的服务业发展影响要素研究——基于珠三角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产经评论*, 2013, 4(2): 14-22.
- [29] 杨仁发, 刘纯彬.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 FDI 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2, (11): 107-116.
- [30] 张杰, 李克, 刘志彪. 市场化转型与企业生产效率——中国的经验研究 [J]. *经济学(季刊)*, 2011, (2): 571-602.
- [31] 沈坤荣, 耿强. 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5): 82-93, 206.
- [32] 胡艳, 朱文霞.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 [J]. *产经评论*, 2015, 6(2): 5-14.

[60] 金晓雨. 城市规模、产业关联与共同集聚——基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联和空间互动两个维度[J]. 产经评论, 2015, 6(6): 35–46.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Producer Services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y Hierarchy

ZHONG Yun ZOU Yun-long

Abstract: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ust be affected by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in the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he effect different in the different size of cities. In the research of producer service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framework of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makes the global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as the three main explanatory variables. Then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transition to the producer services development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use the theory of city hierarchy to classify the 28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compare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transition in different grade cities on producer services. We find that: (1) The impact of economic transition on producer services has not been fully reflected; (2) Globalization plays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on the producer services development whether in the national level or the city hierarchy; (3) Marketization hasn't show th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national level, but shows th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high-order cities; (4) Decentralization shows the improvement to the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national level and the high-order cities, but hasn't show the improvement to the low-order cities.

Key words: producer services development; economic transition; city hierarchy; interaction

责任编辑: 戴天仕

DOI 10.14007/j.cnki.cjpl.2016.04.007

引用方式 钟韵, 邹云龙. 城市等级视角下经济转型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差异[J]. 产经评论, 2016, 7(4): 79–89.